

编者按：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沿江连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全国40%。长江经济带具有独特资源优势 and 要素禀赋，改革开放以来，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具有非常独特的经济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改革开放40年来，经过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长江经济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发展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长江水道存在瓶颈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

习近平主席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等关系。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加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不是不搞大的发展，要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适合的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

大江无声，变革早已悄然发生。以创新和转型为主旋律的新理念、新产业和新业态，已植入长江两岸。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正在让长江经济带焕发新生机。长江经济带，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40%的经济大走廊，正在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探索新路径。

本期推出“长江经济带”专题，总结党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剖析长江经济带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兼顾、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并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进一步分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苏省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扛起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前列的重任，调整产业布局、推动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办法。希望对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长江经济带

- 02 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 04 关于长江经济带，习近平在下这样“一盘棋”
- 06 扛起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前列的重任
- 07 发展现代海洋经济 打造江苏新增长极

经济纵横

- 10 多面体折射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从何而来

文化漫步

- 15 “减负”与“素质教育”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义

悦读时光

- 封三 我给总理做十年秘书（三）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述评

在中国版图上,有这样一片区域,它形似巨龙腾飞,支撑起全国超45%的经济总量、涵养着超过四成的人口。在世界版图上,这片区域同样备受瞩目。在这里,全球金融中心与脱贫攻坚主战场并存。“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寄予很高希望。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长江经济带迎来了发展新篇章。



长江九江瑞昌段的沿江景观带 新华社发

深刻变革 事关全局的发展理念嬗变

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长江源头金沙江流经此地“神奇”地拐了一个100多度的大弯,形成一个“V”字,从此“大江东去”。今天,远眺金沙江,沿岸柳林依依,一幅绿色画卷讲述当地绿色发展的故事。“以前都是荒滩,现在柳树成荫,空气好,阴凉,我们经常过来休息。”84岁的赵碧老人是退休教师,见证了金沙江石鼓段两岸从荒芜到葱绿的过程。1998年8月19日,新华社播发《长江上游仍在砍树》一文披露金沙江、大渡河沿岸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滑坡塌方不断的场景,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在国家有关部门主导下,长江上游地区天然林保护

工程同年启动实施。“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玉龙县金沙江岸边的变化,正是长江沿线发展理念转变的缩影。“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面对一度伤痕累累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殷切期望,为长江经济带沿岸转变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

在云南昭通,“两个U盘工作法”初见实效,地方部门借助无人机航拍,对市级17条河流、3座水库采取航拍和地面拍摄相结合的方式,用一个U盘存下问题,另一个U盘记录变化,以视频存照推动各级河长履职尽责。在湖南,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展开“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拉网式排查湖区工业企业,对洞庭湖区挖沙、种杨、非法捕捞、侵占湖泊湿地、工农业污染和城乡生活污染等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整治,湖区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上海崇明岛,立足于“生态立岛”理念,制定发布《关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减并举,划定生态红线,开启了建设“天蓝、水清、地绿、民富”的世界级生态岛新征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李白诗中描绘的情境,如今再现壮阔的三峡库区。“这是事关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更是事关全局的重大发展理念嬗变。”

扛起重任 开启高质量发展之路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

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进而致力于培育发展先进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孕育更多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寄予很高希望。在地处长江下游的安徽省芜湖市,走进方村工业集中区,一片绿意盎然,干净明亮的厂房竖立在道路两旁,很难想象就在年初,这里还是“遍地污染”。



长江岸线南通段一处港口码头,一艘货轮锚定后,工作人员合力牵引岸电连接电缆。新华社发

成立于2004年的方村工业集中区共有218家企业,曾经违规生产偷排现象随处可见,年初地方督查的90家企业中79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历时近3个月的环保整治,方村关闭取缔100多家企业,整改验收数10家企业。“园区是街道的经济支柱,占到经济收入总量近七成,考虑到税收与就业,以往整改的决心总是不足,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芜湖市方村街道办事处主任吴彬说。

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下大力气倒逼产业转型。方村转变的背后,折射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坚决摒弃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在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市,2017年否决了26个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涉及总投资20亿元。全市排查出的360家区县化工企业,正在按照“一厂一策”专项整治,有望较好解决“化工围江”问题。“破旧”不忘“立新”,长江经济带得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听话”鼠标、能纠错会教学的智能钢琴、陪护机器人……,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的中国声谷,

依托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科大国盾等龙头企业,330余家企业构成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平台支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链。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在内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上半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2348亿元,同比增长14.7%。新兴产业为“上海制造”带来一批新名片: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研发和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新发展,新气象。纵观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长“成绩单”,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10个省市GDP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云南、江西分别以10%、9.2%、9%依次位居前三,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展现出巨大的澎湃动能。在张燕生看来,新时代的长江经济带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新引擎。

坚定信心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迈向高质量发展

盛夏,坐拥长江黄金岸线,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片忙碌。不远处,已全线贯通的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向更大吨位的全球货船张开怀抱。300亿元:3000亿元,这是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服务业和工业产值的差距。“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定义未来产业。”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蒋伟说,开发区未来的转型方向就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以双轮驱动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扮演好南京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擎”角色。引入新能源汽车企业拜腾全球总部,建设从事人工智能的旷世科技华东总部,迎来创新工场南京研究院……有着近30年历史的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书写发展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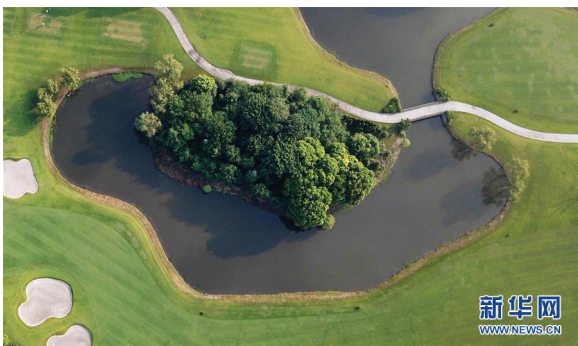
“从2016年底的第一次会谈,到今年6月全球总部正式启用,试制样车下线,短短18个月,蓝图正有条不紊地变成现实,让我们感受到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带来的‘南京速度’。”拜腾联合创始人、CEO毕福康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一幅新时代的长江奋进图正在绘就——加快质量变革、效率

关于长江经济带，习近平在下这样“一盘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既相对独立，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以“一盘棋”思想从总体上谋划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

整体合力”。如何下好长江经济带这盘棋？2018年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错位发展。长江经济带集聚的人口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40%，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无序低效竞争、产业同构等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一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圈地盘、抢资



素有“长江绿肺”之称的江苏扬州润扬森林公园景色 新华社发

变革、动力变革，长江经济带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致力于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长江经济带将以更加开放创新的姿态，支撑起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这是中国经济开启未来的定力与信心——“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勾画了长江经济带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两年多来，覆盖全域的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共抓大保护的合力正在形成——2017年6月30日，在重庆

召开的首届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联席会议上，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审议通过《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实施细则》；一年后，四省市推动共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三大重点方案63项工作落到实处。

2018年1月，为进一步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在上海专门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6月1日，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在上海举行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提出要强化战略协同、要聚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共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进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要共建共享民生工程、要创新完善合作机制……

“人心齐，泰山移。”中央和地方之间、沿江各省市之间、中央各部门之间……多层次协同发展释放出巨大合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新时代，新起点。肩负使命，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必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苦干实干、久久为功，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2018-8-11 新华网）

源、条块分割、无序竞争的情况,还存在抢占发展资源、缺乏协作精神、破坏产业链条的连接和延伸等问题,极大地制约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因此,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市都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以系统思维下好长江经济带“一盘棋”。一方面,各地要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自身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规则,以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习近平指出,“要简政放权,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清除市场壁垒,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要探索一些财税体制创新安排,引入政府间协商议价机制,处理好本地利益和区域利益的关系”。

协调发展。习近平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建立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更好发挥统领作用。发展规划要着眼战略全局、切合实际,发挥引领约束功能。”要增强系统思维,将各自为政的孤立式发展改变为区域协同的联动式发展,推进沿线地区效率最大化和发展一体化,让区域经济更具均衡性和可持续性。要坚持共商共建,充分发挥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作用,着重在“共”字上做文章,抓好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一体化建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工作重点,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目前,重庆、四川、云南、贵州4省市签署了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议,湖北、江西、湖南3省签署了长江中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议和长江中游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联合宣言。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重大问题,如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怎样统筹协调发展、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综合运输效益,如何优化已有岸线使用效率、破解沿江工业和港口岸线无序发展问题,等等。”

有机融合。融合发展是社会重要规律之一。新时代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必须用融



合发展来妥善处理各类主体之间的矛盾。建设长江经济带,是实现城市和区域融合发展的创举。习近平指出,要“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习近平强调:“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要增强系统思维,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使沿江各省市协同作用更明显,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城市群就是城市的有机融合,要优化谋划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布局,坚持大中小结合、东中西联动,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这三大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同心合意,庶几有成。”新时代是一个协调的时代、融合的时代、共赢的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大局观、协调观、融合观,需要整体发力。习近平指出:“推动好一个庞大集合体的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再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方面下功夫,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

(2018-6-26 学习中国)

扛起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前列的重任



江苏对镇江220千伏五峰山跨江线路启动升高改造工程,进行旧线拆除施工。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保护长江生态、焕发母亲河生机提供了根本遵循。江苏80%的生产生活用水源自于长江,沿江8市经济总量占全省八成,产业、城镇、人口高度密集,是全省经济的“发动机”。我们有责任扛起这一重要的使命担当,努力走在全国前列。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江苏必须摒弃一切不相适应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纠正一切不相符合的片面认识和错误做法,突破一切发展中的束缚和障碍。从历史与未来的维度,深刻理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由于发展阶段的局限,过去我们对长江更多的是“索取”,这条路已经难以持续,总书记讲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在长江江苏段表现同样明显,当务之急要回馈反哺、修复长江生态。保护长江就是保护未来,就是为长远计、为子孙谋。

从国家战略意图与江苏现实需求的角度,深刻理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指向。当前,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仅是保护长江生态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以长江为发力点、取势长江经济带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

抉择。我省沿江地区一直是化工产业的主要集聚区,调整产业布局、推动绿色发展已经刻不容缓,江苏必须在贯彻国家战略中打“主攻战”、当“急先锋”。

从使命与担当的高度,深刻理解“树立一盘棋思想”的内涵要求。从区位上讲,江苏地处长江下游,江河湖海水网密集,水域占比为全国之最;从地位上讲,江苏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基础最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我们既要服务“全国一盘棋”,也要下好“全省一盘棋”,特别是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从沿江8市拓展到省域全境,把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和产业布局优化统筹起来推进,把江苏放到整个长江流域发展中来考虑,真正做好标本兼治、协同推进的大文章。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后,我们系统进行研究,迅速展开贯彻落实的工作布局。

坚持规划先行,形成“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关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全省化工钢铁煤电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运输走廊规划》3个文件,把年度工作要点细化为35项具体目标,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

全面展开部署,发出新的“动员令”。召开全省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推进会,通过播放专题片等形式揭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使大家深受警醒,有力地统一了全省上下的思想认识,并且按照“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列”的目标定位形成路线图、任务书。

以整改为契机,啃下一批“硬骨头”。结合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深化实施“263”专项行动,针对突出问题“下猛药”,明确全省化工产业不上增量、优化存量、严控总量,沿江沿太湖地区不新上化工、钢

发展现代海洋经济 打造江苏新增长极

近年来,江苏加快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海洋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已经成为江苏国民经济重要增长点。面对当前存在的港口节点作用不突出、临港产业集聚力不强、海洋科技服务较为薄弱等问题,建议我省充分发挥陆海兼备、滨江临海的地缘优势,紧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机遇,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二是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三是建立开放型港口经济体系,四是建设海洋创新生态系统,五是健全海洋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最终打造江苏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铁、煤电产业,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对污染企业“壮士断腕”,今年上半年全省关停规上企业近3000家、限产1000多家。

目前,江苏工作开局良好,但形势仍然严峻。我们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举全省之力狠抓贯彻落实,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在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上保持压倒性态势。在江苏讲压倒性,就是涉及长江的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生态这个前提,治理污染不讲条件,严控空间不让分毫,修复生态不打折扣。如果说过去是“用空间换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花钱买空间”的时候,必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大规模增绿,抢救性复绿,加快建设生态安全带和生态保护区,抢救性保护长江、太湖等自然湿地,让绿色成为长江的鲜明底色。

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根本性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推进沿江产业布局调整,加快培育以智能制造为标志的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与先进制造业深

一、江苏现代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港口节点作用不突出。江苏沿海港口数量众多,以连云港为代表,2016年底已建成30万吨级航道,成为真正的综合性国际深水大港。然而,江苏以港口为枢纽,以集疏运体系为支撑的高效江海河、铁公水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港口集疏运体系尚存漏洞,港口现代物流、对外开放、多式联运等服务功能仍需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港口少,发展中港口多;港口规划建设的协调性不够,各地均投入大量资金争相推动港口建设,导致港口运行中出现功能交

度融合的现代服务业集群。按照百年精品、最美风景的标准,规划建设高铁、航空、港口、过江通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做大做强现代枢纽经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推进跨江融合发展,着力形成长江经济带繁华都市、田园乡村相辉映的最美地区。以改革创新形成制度性保障。主动对接上游省市,全面深化省际协商合作,创新协同保护机制,共饮一江水、共保母亲河。加强全省统筹,围绕生态环境管控、污染治理、产业转移、岸线保护利用等方面,坚持改革和政策同步发力,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有效机制。

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的就是长江江苏段的景色,“春江潮水连海平”“江天一色无纤尘”,这样的人间胜境不能仅是诗篇里的怀想,更应该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人生代代无穷已”,但一茬人有一茬人的责任,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唱好新时代的长江之歌,再现大江东去、万里清波。

(2018-8-11 经济日报文/娄勤俭)



又,难以形成规模集聚效应;港口过度建设,功能上缺少协调配合,影响了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限制了有潜力港口的发展壮大,港口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尚未形成。

2. 临港产业集聚力不强。江苏临港产业中对海洋经济拉动最大的是传统海洋产业,这些传统海洋产业的比重较大。比如,江苏海洋渔业养殖、船舶修造、滩涂农牧业占全省海洋总产值的 25% 以上,而广东、福建、山东的传统海洋产业比重已经下降到 17% 以下。在新兴海洋产业中,江苏的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等产业发展较快,但是没有形成规模,产业集聚效应低,港口物流等关联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海洋旅游资源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对沿海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对江苏海洋经济的贡献有待进一步提高。

3. 海洋科技服务较为薄弱。一方面,江苏海洋科技支撑能力不强。信息技术、物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在海洋经济管理、港口生产运营中的应用比例较低,沿海海洋经济相关产业信息共享化、网络化推行困难。2016 年,江苏海洋科技贡献率不到 50%, 产值贡献率较高的港口物流、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航运服务等发展明显滞后于山东、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另一方面,海洋科技创新及产业化水平不高。江苏海洋科研机构归属不同部门,相互之间的协调和整合度较低,总体战略部署难以进行。海洋科技人才匮乏,科技力量分散,涉海教育相对薄弱,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自给率较低、成果转化率高,海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难以形成。

二、江苏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对策建议

根据“1+3”功能区战略部署,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和江苏沿海开发的实施要求,树立“依托海洋谋发展”的战略意识,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并举、海洋经济与海洋科技并举、海洋生产与海洋服务并举的理念,推动海上陆地与交通联动、产业联动、生态保护联动,打造江苏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1. 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沿海三市要抢抓机遇,着力建设空间载体、产业载体、港口载体及项目载体等,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业化水平,重点实施包括滩涂资源开发、港口群建设、海岛开发、滨海旅游城市建设、海洋资源深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等六大工程项目。努力优化港、产、城互动发展格局。省级层面出台引导政策,推进海洋经济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推动陆域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海洋流动配置,促进城市功能的提升和陆域经济的发展,着力推进产业园区化、园区城镇化、城镇生态化,实现产城集群发展。本着以产兴城、产城互动、整体推进的要求,把园区建设和港城发展,尤其是新区建设结合起来,将产业园区建成港城的一个功能区,使之成为港城的一个亮点。结合主体功能区、工业园区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实施港产城一体化规划建设,构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沿海新城,实现“产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港口集中”,加快形成沿海港口集群、产业集群、城市集群。

2. 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一方面,着力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海洋产业集群,引导海洋服务业提质增效。紧紧围绕“L”型海洋经济带和“一带三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采取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引导适宜布局沿海的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壮大和培育海洋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推动海洋经济跨越式发展。确立海洋产业集群发展目标,制订江苏特色海洋产业集群建设方案。加大海洋渔业、临海重化工业、海洋交通运输、盐土农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力度。全力培育壮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新

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业等海洋新兴产业。把服务业作为现代海洋产业调整升级的战略方向,推动产业发展重点从资源开发转向海洋航运、海洋金融、海洋法律服务等高附加值的高端海洋服务业。

3. 建立开放型港口经济体系。放大港口资源优势,围绕开发建设现代化综合大港的目标,加快推进政府主导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完善沿海基础设施网络,加快港口物流、科技创新、海洋对外开放和海洋开发投融资等平台的建设步伐,逐步形成临港工业及物流业发达、综合运输体系和港航设施完善、腹地经济广阔、产业配套齐全、港口运行机制协调的现代港口经济体系。充分利用沿海铁公水、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的优势,加快建设沿海大通道。发挥沿海高铁、沿海高速公路、沿海高等级公路以及通榆河水道及各通港道路的综合效能,发挥淮河、灌河、通吕运河等在江海河联运中的作用,建设沿海产业带与大运河生态带的连廊。发挥南通“靠江”、“靠海”、“靠上海”的区位优势,发挥盐城滩涂广阔、湿地资源多的优势,发挥连云港作为“东方桥头堡”和“东中西合作示范区”的战略优势,把这些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战略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辐射带动苏北地区大发展,形成开发海洋、发展沿海、联动全省的局面。

4. 建设海洋创新生态系统。探索“海洋+互联网”的发展模式,运用现代技术开发海洋,引导海洋传统产业智能生产、绿色生产,提高海洋工业的高技术水平和产业化能力,平衡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资

源管理。以前沿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牵引,围绕海洋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使创新驱动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发挥南通作为“国家级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盐城、连云港两市“国家级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步伐。加强与国内外、省外涉海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在河海大学、南通大学、盐城师范学院、淮海工学院等高校开设海洋经济相关专业,设立国家级海洋经济重点实验室,培育海洋工程技术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海洋科技示范园区。推动国家级大院大所落户沿海三市,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性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对海洋经济运行进行科学分析评估,努力打造海洋科技创新及产业化高地。

5. 健全海洋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健全省海洋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决策,督促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重大项目,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实现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优势产业统筹培育、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生态环境统筹整治。适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海洋产业的资金支持,加快设立沿海产业基金,组建沿海发展银行,多元化使用金融手段,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资金保障。由省海洋渔业主管部门和省社科联牵头相关科研院所和智库,加强研究江苏海洋资源竞争力、海洋人力资源竞争力、海洋科技竞争力、海洋经济竞争力、海洋活动竞争力、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为江苏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

(2018-5-28 江苏社科网/决策参阅)



多面体折射下，中国经济的韧性从何而来

2018年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资产定价环境呈现出历年少见的复杂性。一方面，经济有显著的韧性特征；另一方面，美国加息周期的推进导致全球无风险收益率有震荡上行的趋势；贸易摩擦的演进伴随外部环境的超预期变数；金融去杠杆亦带来信用环境二元化，这几个因素难免都会影响下一阶段的经济表现。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遵循“经济解释”的精神，详细拆解2018年上半年经济的逻辑和资产表现的逻辑。我们相信，只要这一梳理足够合理，关于未来的结论就能够更为清晰。

1. 全球大类资产在用脚投票微滞胀还是微衰退？

2016—2017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轮逐步的复苏。至2018年，复苏基本上到了后段。以美国经济为例，其失业率下降至经验低位，时薪增速和通胀预期开始上升，加息举措出来。整体来说比较像教科书模式下的复苏走向过热。那么未来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走向滞胀，即价格继续走高，伴随增长动力边际触顶；一种是走向衰退，即量价最终都被政策收紧压下来。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观测全球大类资产表现，可以发现它大致在为一种介于复苏与滞胀之间的情形用脚投票，我们可以称为“微滞胀”。这种特征包括：第一，美债和德债整体来说在震荡上行；第二，原油和工业原料价格震荡向上，农产品在过去4个季度中开始向上；第三，全球主要权益市场指数（如标普500、法兰克福DAX）自年初以来高位徘徊，



但没有显著下跌。显然，大类资产在用脚投票微滞胀。如果是预期走向“微衰退”，则三类资产基本上都应该不同的情形。至少在贸易战之前，资产比较清晰地指向同一结论。贸易战的升温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现状是一个外生冲击。逻辑上说，如果贸易战影响扩大，则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走向“微衰退”的概率就会显著加大。我们可以看到资产基本上沿着这一逻辑反应。在美国对中国征税清单出来的6月15日前后，大类资产的一个趋势是债券收益率往下、原油和工业品价格往下、权益市场往下。

综上，可以确定的一系列重要结论是：1) 2018年上半年，全球大类资产在投票向未来微滞胀，这一点反映一致预期。2) 在贸易战升温后，大类资产关于衰退的担忧陡然上升。这一趋势之外的因素是贸易争端的扩大化，也是我们理解未来会有假设上的分化的原因。3) 未来更靠近哪种情形要看贸易战的演进，这一点并不完全可测。目前的资产定

价更像一种临界情形,逻辑上要综合考虑两种特征的影响,及其背后所面临的宏观不确定性。4)这种处境对于政策也会产生复杂影响。在后面关于中国经济、政策和资产定价逻辑的部分,我们还会涉及类似逻辑。

2. 中国经济的韧性从何而来

2018年经济的韧性特征比较显著。在2017年底,市场悲观预期一度认为2018年Q1是经济拐点,但实际上2018年Q1的GDP是6.8%,持平于2017年Q4;名义GDP也有10.2%。于是悲观预期又进一步后推至Q2,但实际上,4月和5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7.0%和6.8%,分属2017年6月以来高点 and 次高点。前5个月的出口增速为13.3%,就年度值来看是2012年以来最高。估计Q2的实际GDP增速应大概率在6.7-6.8%的区间,名义值应不低于10%。于是市场悲观预期再度后推至Q3。

2018年中国经济的量价特征都有回落趋势,但斜率并不陡峭,整体来说目前依然在中高位。且4-5月,经济的量价表现环比来看要好于Q1末,可谓韧性特征明显。一句话概括,就经济内生趋势来看,它似乎摆脱了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名义GDP角度,至少2017年以来如此),转而呈现出低波动率的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季度中的的这种低波动率特征从何而来?我们猜测有以下几点原因:

贸易部门的高活跃度与基建投资回落形成对冲。2018年不止中国,全球贸易活跃度都比较高。1-4月中国出口增速为13.6%,美国、欧盟27国、中国、日本出口额合并增速为18.6%。2018年的全球出口处于过去7年以来最高的水位上。这种高景气度主要来自于经济基本面。我们用摩根大通全球PMI来代表全球经济的景气度,即平常理解的“外需”。可以看到出口与全球经济的景气表现,基本上保持着月度频率的一致性。出口对于GDP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通过“出口产业链”对于GDP的影响,即它会广泛影响支出法下的资本形成,甚至是最终消费支出。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出口对于GDP的影响要高得多。2018年出口产业链偏强,

1-5月增速几乎是去年全年增速的一倍;同时,基建增速从2017年的15%左右回落至10%以下。可以说,如果没有基建的下行,旺盛的出口可能会导致经济有过热趋向;同样,如果没有出口部门的对冲,这么大幅度的基建下滑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二者形成的“对冲效应”导致经济呈现低弹性波动。

第二,房地产限价与低库存的组合导致“地产周期”(销售、投资两端)的弹性下降。历史上的房地产调控多是以“逆周期”的特征出现。调控周期一旦落地,地产会受到需求、供给两端政策的强力干预;调控周期一旦结束,被抑制的需求和价格又会反弹。库存的高波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波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的高弹性波动与地产周期的高弹性有很大关系。2017年以来,一则房地产调控普遍采用新房的限购、限价、限售“三限”相结合这一相对稳定和长效的方式,并通过新房影响二手房。二则去库存整体比较成功,截至2018年Q1,百城库存总量43000万平方米,基本上回到了五年前的水平;库存增速亦基本上是历史最低。

这一新特征带来了一系列连带影响:首先是价格,限价和低库存导致新房有“中签”效应,价格相对坚挺;新房价格是二手房价格的指引,由于新房价格普遍较同一区域的二手房折价,二手房价格的上行受新房绝对价格影响,存在天花板效应;变动趋势受新房价格的变动趋势影响,亦不存在典型下行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稳定折溢价。这是我们看到2017年之后房价波动弹性变低的原因。其次是销售,房地产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价格预期的影响,即一旦预期价格要下跌,除刚需之外的需求会快速撤离,部分刚需也会进入观望,比如2008年和2013年都曾经出现过。在价格预期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地产销售增速不至于跌幅太深。70城房价指数缺少最新数据,我们用区域房价指数大致来观测一下,2017年之后价格波动收敛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然后是投资。销售相对稳定带来销售回款相对稳定;限价导致开发商更依

赖于稳定的销售回款；它和低库存的状态并存导致新开工存在韧性。整体来说，2017年以来“地产周期”的弹性下降，这一点是经济呈现低波动特征（韧性）的背景之一。

第三，供给侧改革后的原材料价格与库存低波动导致产成品库存周期弹性变低。第三个链条与制造业有关，我们先从它的上游即原材料谈起。供给侧改革一则减少了上游的落后产能，二则导致既有产能主要集中于规模以上企业，这类似于猪肉的供给端效应，导致供给更少出现一哄而上的扩张。我们可观测到的结果是库存整体偏低，以及波动性下降。同样改变的是价格的波动性。供给冲击变小逻辑上会导致价格波动性下降；在现实过程中，价格的过快上涨也会面临上游限价。所以原材料价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往下有低库存，往上有行政限价。下游一般会盯着上游价格来决定库存。由于原材料库存的新特征，整个工业价格和产成品库存的波动性也会下降。我们观测中美库存周期，可以看到其大的拐点依然保持一致性，但2017年以来中国这轮库存周期走势明显偏平，这一点导致名义GDP也相对偏平。

3. 贸易战：待观察的增量资产的冲突

贸易战在某种意义上是中美增量资产的冲突，对于贸易战的长期性要有充分准备。3月下旬以来，贸易摩擦逐渐升温。6月15日，美国宣布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6小时内，中国政府立即发布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生效时间和美方一致。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国已经挑起贸易战。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中方不得不予以强有力回击。关于贸易战，各方研究者都有不同角度的理解。而我们基于经济基本面的认识之一是，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增量资产的冲突。二战之后，全球产业格局屡次变迁。60到80年代是日本、德国制造业崛起；90年到2000年，四小龙和四小虎崛起；2000—2008年是金砖四国（BRIC-s）；2008年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制造业趋势在出现，那就是中高端制造业开始在中国萌芽和初步发展，

中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这两个最大的正在转型的经济体被我们称之为“U2”（Upgrading two economies），它是全球制造业的两块α。对于过去10年来说，中国和美国的存量资产是一种天然的分工合作的关系，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伴随美国的信用扩张；中国产业升级伴随美国制造业外移和消费扩张。而中国制造业走到现在，再进一步升级，则与美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战略目标存在一定冲突，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增量资产的冲突”。新华社指出“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浪潮，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纷纷推出自己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作为工业大国，也在积极应对挑战，推进制造业升级”、“美国拟征税清单所列领域与《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重点领域基本重合”。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甚至直言301关税“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从增量资产的冲突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摩擦可能会类似于60—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对此，新华社也指出中国“对两国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已做好充分准备”。贸易战的影响主要有五个传递逻辑。参照之前的经验情形及此次贸易战磋商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重点领域，贸易战在预期上会带来五个逻辑下的影响：

逻辑一：可能存在的对全球贸易环境及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贸易保护措施会有连带效应。5月31日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的钢铝等制品征收25%或10%的关税。6月14日，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一项对28亿欧元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同期，墨西哥官员称，若美国开征新关税造成贸易争端升级，墨西哥或对每年进口达40亿美元的美玉米和大豆开征关税；6月20日俄罗斯表示近期内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采取报复措施。如前所述，本轮全球经济景气度在一定程度上与贸易高活跃度有关，贸易战可能会给全球贸易环境及全球经济带来一定影响。这一块的动态影响难以确切估算，一个标尺性的理解是根据贸易弹性圈定贸易影响规模，根据贸易影响推算GDP影响。比如根据标普的测算，如果贸易战最终落地，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

1%。根据欧央行的测算,在极端情况下(美国对所有进口品加征10%关税),贸易战可能会导致当年全球贸易增速下滑3%,对应经济增速下滑1%。一年之后影响会更大。

逻辑二: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出口及出口系产业链的直接影响。美国公布的加税产品清单主要是按比较细的产品分类,把它们变成行业分类会更直观一些。根据HS行业分类方法,全部国际贸易商品分为22类,98章。美国公布的对华加征关税清单集中在HS分类中第40章、第84至90章,集中在工业制造领域,主要涵盖机械、电子电器、交运设备、轨道装置等行业。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这些行业的主要特点为出口依赖度较高(出口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约为10—20%,其中光学仪器行业高达35%左右);增加值创造能力分化比较明显,机械和交运设备增加值率偏高,电气设备相对较低。

逻辑三:可能存在的对于技术正常流动的约束及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5月29日特朗普曾表示,为制止中国收购美国技术,美国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对在中国在美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投资设置新的限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声称新投资限制的具体内容将在6月30日之前公布。从经济学的逻辑上来说,技术要素和人才要素的流动是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贸易战的情形下,如果技术流动被人为约束,一则是全球资源配置会面临效率净损失;二则因为存在上游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约束,中国相关产业的产业升级可能会受到一定约束。

逻辑四:可能存在的扩大进口、降低投资门槛对国内相关产业需求的竞争及替代。5月22日,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从2018年7月1日起,我国将降低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关税税率。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此外,扩大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进口也是扩大进口的重要方向。除直接产品外,另一个领域就是投资准入门槛。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提出要在今年7月1号之前修订出台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稳步扩大金融业的开放,持续推进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服务领域的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对外开放,特别是要取消或者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投资者高度关注的制造业领域开放。要加大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力度,拓展电信、文化、旅游等领域开放试点。扩大进口、降低准入门槛会产生中长期“鲶鱼效应”,提升相关部门的经营效率和竞争能力;但就短期来说,可能对相关行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

逻辑五:可能存在的减少直接产业补贴及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减少直接补贴,推动战略新兴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和中长期竞争能力的提升可能是一个趋势。这一点将对相关行业的短期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这几个逻辑的影响并不是叠加的关系,采取哪几种情景假设取决于未来事件如何演进。所以严格来说贸易战对于GDP的短期影响没有办法准确测算;但对于其中期影响则不可低估。在贸易战升温背景下,可能会存在一些相对确定的结论。在贸易战升温的背景下,我们认为相对确认的结论包括:第一,下半年经济增长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大。4月26日政治局会议强调,“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第二,内需是压舱石,内需的稳定性将更为重要。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第三,政策层重视外部环境变化,将适时做出政策调整。6月19日央行行长易纲就股市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称,“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们将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

关于下半年,我们关于几个重要领域的判断如下:

1. 基建可能已经处于年内的底部区域,后续低斜率回升。

2018年1-5月新口径基建投资增速只有9.4%，老口径基建增速只有5.7%。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行的原因包括：第一，PPP项目清理的影响。今年1-4月是PPP项目清理的密集期，据财政部统计，截至4月下旬，全国各地累计清理退库项目1695个，涉及投资额1.8万亿元；上报整改项目2005个，涉及投资额3.1万亿元。第二，金融去杠杆中表外融资收缩，影响基建项目资金来源。基建融资来源广泛包括预算内资金、政府性基建、委托和信托贷款等非标、债券、贷款等，今年1-5月，社融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46万亿，其中绝大部分是表外被清理，这增加了基建投融资的压力。第三，在规范地方举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政策导向下，上半年广义财政几乎没有扩张。从地方专项债的规模来看，今年1-5月几乎没有新增。这一点和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政策导向有关。不少地区大的基建项目都做了主动压减。第四，电力等公用事业部门投资受供给侧改革影响，投资出现史上最严峻的收缩，拖累了旧口径的基建投资。今年1-5月公用事业部门投资增速为-10.8%，基本上是有史以来最低。这对于旧口径（和去年比较）的基建投资形成一定拖累。

2.即使没有贸易战，出口下半年也会低于上半年。

从基本面推断，2018年下半年出口增速会有所下降，主要理由是：1)出口是一个含价指标，HS2随PPI放缓大概率带来出口额放缓。从经验规律看，出口增速与其价格指标HS2的走势基本一致，而HS2与PPI走势大体一致。从翘尾因素看PPI，其在6月后大概率经历一个回落期。2)欧洲经济的放缓将会滞后带动对欧出口放缓。从经验上看，出口一般滞后于经济指标（如PMI）1-2个季度。本轮欧元区PMI回落始于1月，3月之后回落有所加速；而对欧出口回落4-5月初步出现，但幅度甚微。我们估计后续反映程度应会有所加大。3)美国库存周期的调整期可能会带动中国对美出口放缓。美国制造业库存可以视为美国制造业的名义增长的影子指标，它基本上按基钦周期的规律变动。从目前位置和作

为先导指标的上游价格来看，库存周期调整可能是一个大概率，这对应着制造业需求放缓中国对美出口放缓。贸易战的影响是另一部分。目前全球其它市场也开始对美国的单边征税进行贸易反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出口；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清单最终实施，相关商品可能会在既定出口价格弹性下以一定比例收缩。

3.房地产销售和存在经验支撑

关于房地产，以往的一个常识是销售和资金来源领先于新开工、新开工领先于投资，但从最近两年的数据规律来看，这种领先滞后性已经不明显，有时候甚至是凌乱的。这与房地产去库存和新房限价之后地产传统经营节奏的打破有关。我们可以大致把这几个指标视为方向一致的同步指标。那么，地产销售和类指标的走势，主要受什么影响？逻辑上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库存（供给端）；二是利率（需求端）；三是调控手段（政策端）。

首先看以下供给端的库存。我们用待售-销售作为库存的影子指标，可以看到它与新开工是大致的负向关系。过去六个季度中新开工基本走平，与房地产去库存之后的低库存和库存的钝化有很大关系。这一特征很难在2018年下半年出现大的改变，即我们可以认为新开工是向下低弹性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需求端指向标的利率。利率与地产销售经验负相关（利率倒数与地产销售周期走势基本一致），原因可能一则是利率上升/下降会增加/减少购房成本；二则利率上升带来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承诺回报率上升，会对投资性购房意愿有替代。商品房销售负相关且略滞后于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步或滞后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率在Q2整体是震荡下行的，我们倾向于认为下半年利率将是3.5-3.9的一个震荡区间。考虑到利率的领先性，Q2-Q3地产销售可能仍处于前期利率趋势的正向支撑之下，后续将会区间波动。只有当利率大幅向上的时候，销售才会大幅向下，在边际趋于更宽松的2018年下半年，这个风险并不大。

（2018-7-25 财经头条）

“减负”与“素质教育”对中国社会各阶层

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成分太重,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围绕应付升学考试,不太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因而为人所诟病。社会上一直有改革这种教育的呼声,教育家们也致力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很大,成绩显著,中小学生的减负教育、快乐教育、素质教育、游戏教育等蔚然成风,书包减肥、释放天性、学历无用等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减负”与“综合素质”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实践与改革的政治正确,改革的目标和手段都围绕这二者转圈。

但是另一方面,调研发现,学校在不断调整制度、制定政策给学生减负,包括不布置作业、教材内容简单化、压缩学生在校时间、小初不再笔试、增加文娱活动内容等,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支配时间快乐成长和提高各方面素质。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学生的负担不减反增。学校的减负改革确实减轻了学生在学校的上课负担,但增加了学生在校外的学习任务。因为减负教育是在小初阶段,并没有对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以配套改革。小初是素质教育,但升学却是应试教育。

为了小孩能够在升学中胜出,学生家长就得在校外给小孩提供额外学习的机会,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购买市场化教育。家庭教育需要家长带着小孩学习,陪伴小孩做作业,给小孩批改作业,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在市场上购买的教育资源既有语数外等文化课内容,也有音体美等素质教育项目。小初学生走出学校后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伏案写作业,就是在培训班里上课,或者是在去



培训班的路上。学生的负担在减负教育中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减负教育还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让大部分家长苦不堪言。首先是增加了接送小孩的负担。为了减少学生在校时间,越来越多地方实行禁止学生早上早到学校、下午提前放学的规定。浙江省教育厅就规定小学生不能在八点之前进校,许多学校在八点半、九点才开始上课。家长至少在八点之前不能离开小孩视线。过去是六七点钟就将小孩送至学校才去上班,现在最早八点才能将小孩送进学校,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就放学,不说很多学校下午不安排文化课,单说这时候家长还在上班,谁去接小孩放学?有的家庭有爷爷奶奶接送,有的家庭则腾出一个劳动力出来接送,多数家庭是将小孩托管给专业机构。教育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要求各地创造性地鼓励发展托管机构,美其名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既然还是托管,何苦这么早放学呢?

其次是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无论是将小孩托管,还是参加各种培训班,都需要向市场机构支付不

菲的费用。培训项目越多、时间越长、级别越高,家长的负担就越重。再次是减少了家长的休息时间。家长要用休息时间陪同小孩学习,无论是陪同做作业、练琴、跳舞等,还是去培训班,都得占用家长的休息时间。有的家庭甚至是全职陪同小孩。

最后是增加了家长的学习负担。家长要教小孩文化和文娱方面的知识,就得自己前期重新学习,同时家长还要学习如何培养小孩,这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在浙江一城市调研时,当地还有专门对家长进行培训的市场化教育机构。所以,在中小学家长群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现在小孩培养既要“拼爹”,也要“拼妈”——“拼爹”说的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拼妈”则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小孩。而能够拼爹拼妈的家庭,多是“有钱有闲”的人家。

既然基础教育的“减负”改革既没有达到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政策效果,还让家长普遍带来了非预期的沉重负担,那么基础教育改革何以还在沿着这个方向改下去,“减负”的话语为何还有很大的市场?难道制定教育改革政策的那些人不是小初家长,他们没有生活体验?即便手头宽裕、不需要为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担心经济问题,难道他们也不需要接送小孩上学放学?如果是这样,是否只能说明制定教育政策的这些人是“有钱有闲”的人,或者他们是依据“有钱有闲”的人的教育需求来制定教育政策?

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的发展,已从之前分层不太明显的相对均质化社会,转变为阶层差别巨大、层级区隔显现化的异质性社会。根据不同层级所占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差别,以及叙述的方便,可以将中国社会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层,不同家庭处在不同层级,大致可称之为上层家庭、中产家庭和底层家庭。不同层级的人和家庭不仅在思想观念、消费理念、政治态度、行为模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在子女教育、社会流动等也有不同的理念、目标和期待。

(一)底层家庭的教育目标

中国的底层社会由广大工农、城乡小工商业者、小市民等家庭组成,这些家庭在经济上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向小康迈进,但是在完成基本的家庭再生产之后便没多余的活钱。在文化教育上,他们接受了中小学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读书看报,但学习能力较弱。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生活圈子以初级和次级社会群体为主,社会关系网络较窄,关系同质性较强,质量不高,生活性较强而再生产性不足。

在社会资源上,他们占有的资源总量稀少,资源种类单一,一种资源转化为另一种资源的能力较弱。在劳动力分工和配置上,以代际分工为主,性别分工为辅,也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年轻夫妇主外,如务工经商,中老年人主内看家带小孩,农村老年人还要务农。这样分工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了家庭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家庭财富,同时也解决了家庭再生产问题。在社会流动上,底层家庭在代内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是有通过代际合作实现代际流动的可能和愿望。

结合底层家庭的上述特点,他们在子代的教育上有以下特点:一是他们限于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无法对子女进行充分和较好的家庭教育;二是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难以为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三是他们家庭的劳动力配置较为刚性,年轻夫妇必须工作,老年人也有自己的事情乃至还要赚钱,否则家庭就无法完成家庭再生产,那么他们劳动力的时间、精力就无法腾出来放到子女教育上;四是他们不能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资源禀赋等实现自己和子女的向上流动,教育是他们推动子女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

因此,底层家庭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也重视子女的教育,希望子女能够通过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为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亦没有文化水平为子女提供良

好的家庭教育,他们唯一可以寄托的是子女有在学校努力学习的机会,及希望学校能够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好。

(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

中产家庭较为广泛,既包括受过中高等教育、经济收入较高且居住在城镇的家庭,如城镇知识分子家庭(教师、医生、律师、文字工作者、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城镇工商业者、政府企事业单位职员等,也包括农村中务工经商成功、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家庭。这些家庭的社会关系已经超越了初级和次级群体,关系网络较广,关系质量较高,他们的关系异质性较强,除有生活性以外还具备一定的再生产性。他们的资源总量较多,也具有一定的相互转化的能力(如文化资源转化为权力资源)。中产家庭一般是双职工家庭,或是经商成功家庭,他们的家庭收入较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职业受人尊重,有较强的荣耀感和自我实现感。中产家庭在城镇至少在城镇拥有一套房产,子女能够在城镇学校就读。

中产家庭处于社会中层,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较底层家庭要高,也较底层家庭有优越感,他们一般是从底层家庭中实现阶级阶层地位跃升者,较为珍惜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但是他们相较于上层阶层,又有较大的差距,仍有上升的空间。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地位的再次跃升,那么也要让子女继续向上流动。同时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位置就已经牢不可破,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他们有种天生的从底层带过来的不安全感。因此他们虽然对现状较为满意,但并不认为他们就已偃旗息鼓,他们仍在不懈奋斗,拼命地抓取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往上爬,这样既是希望使自己的位置更为牢固,也是为了继续往上流动。他们认定,只有继续往上流动,才更具安全感。

那么在子女的教育上,中产家庭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中产家庭有能力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

读,也有文化给予子女较好的家庭教育,亦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给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但是作为双职工的他们缺少时间;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物质资源可以做到让子代不低于父代的社会地位,不向下流动,但是还难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三是他们对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在家庭既有资源与子代较高教育水平结合基础上推动子代向上流动。因而,中产家庭对子代教育很重视,他们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购买少量市场教育资源,再是辅以家庭教育。

(三)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

上层家庭是指那些拥有较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家庭,包括中高层政治权力拥有者、企事业单位中上层管理者、企业家、高级技术人员、院士专家教授等。上层家庭的规模较小,但其社会关系、资源、权力等密集,他们总体性占有社会的优质资源,其资源的再生产性强,能够实现资源的相互交换和转化。上层家庭拥有这些资源,就能够保障其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稳固地位,并实现社会精英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复制。

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阶级阶层地位。他们有能力为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最好的家庭教师或培训学校,即便他们自己不能亲自接送子女上学放学,也可以雇人这么做。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不是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而是子女的优质成长、综合素质的提高。他们一般对子女要求严格,除了应试的文化知识外,他们要求子女学习广泛的文化知识,他们以子女的“不知”为耻。他们子女学习文化知识更多的是自我修炼、自我提高的一种方式。即便当他们的子女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他们也有能力将子女送进好的学校,或者他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用参加普通中学的应试,而是直接进入西方最好的学校就读。

上层家庭是典型的“有钱有闲”的家庭,在基础

教育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希望学校为学生减负，包括减少学校作业和上课时间，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应试以外的文化知识；二是基础教育不是上层家庭流动的渠道，而是成长的过程和手段，因而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希望子女能够得到全方位发展。总之，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通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应试教育实现子代的社会流动，他们没有能力给子女提供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资源。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是，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以市场化教育并通过应试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上层家庭有能力在学校以外提供足够丰富的教育资源，他们希望改变传统的学校应试教育模式，以强化素质教育。

三个阶层虽然对基础教育各有期待，但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有一致性，主要还是把教育当作代际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对上层家庭来说，教育是精英自我成长、自我提升的方式。教育目标不同，那么教育的制度和方式就不同。传统的应试教育制度有利于底层和中产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却无法满足不同阶层对教育的期待。

譬如，应试教育要求学生花更多时间待在学校学习应试的内容，甚至周末和寒暑假还要补课，这就完全挤占了上层家庭着力培养子女应试知识以外的知识、能力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对应试教育和补课就有意见。但对底层和中层家庭来说，子女的时间都被学校教育给占得满满的，既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应试知识和提高应试能力，有利于在升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还能够将家长从陪伴、看护子女中解放出来，以将劳动力配置到提升家庭经济能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事务上。

以上表明，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与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是对立的，前者认可传统的学校教育，依赖于应试教育的上升通道，后者则要变革传统的学校教育，强化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教

育制度难以兼顾对立的教育需求，那么以哪个阶层的教育需求为教育制度的目标呢？如果以底层和中产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维持传统的教育制度，如果以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彻底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

从最近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占了教育改革的上风。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一是上层家庭总体性掌握社会资源，他们有渠道影响国家教育政策，而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本身也来自上层家庭；二是应试教育确实有其明显的缺陷，而“减负教育”与“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符合人的天性，容易引起社会共鸣；三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经历过高考，对应试教育和“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残酷性心有余悸，他们能够对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给予积极回应；四是旅美回国人员、教育研究者对美国公立教育认识不清，错误地把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快乐教育当作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国内，在国人当中形成了快乐教育、思维训练与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对立；五是同为中小学教育负担重的日本在六七十年代也实行了减负改革，等等。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层家庭对减负、素质教育的诉求就成了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进而成为基础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只要提到基础教育改革，言必称“减负”。在实践中，给中小学减负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轻书包重量、减少作业量；二是缩减学生在校时间，实行晚上学、早放学制度，其逻辑是只要学生在校时间长，学校就会给上课增加学生负担，而缩短在校时间就堵住了学校增加学生负担的可能；三是杜绝中小学周末和寒暑假补课，让学生在這些时间段自由、快乐地释放天性；四是幼儿园不准教小孩识字算数，小学初中不进行笔试（可以通过游戏通关的形式来考察学生的文化知识），初三、高中考试但不排名，以减轻学生的竞争压力和心理负担；五是降低中小学的课程难度，减少了

文化课的内容,现在五年级的难易程度降低到了之前三年级的水平;六是教师不给学生批改作业,由家长来批改和辅导,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践意味着弱化学校教育,强化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责任。譬如,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也就意味着缩短了学校对学生负责的时间,增加了学生的校外时间也就是增加了家长的责任;中小学考试不排名,相应地学校对教师的教学绩效也不再排名,对教师的激励就减弱,教师在教学上的责任和积极性降低;之前许多由学校做的事情,现在都交由家长来做,如批改作业、预习复习辅导;有些文化课学校不再教授,需要家长去弥补,等等。总而言之,对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来讲,弱化学校教育之后出现的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留出了大量的非在校时间,如何去填补需要回答;二是文化课的内容减少、难度降低,意味着在学校学到的文化知识减少,如何去弥补需要回答;三是在学校的学习压力降低,学习的动力如何来需要回答。同阶层的家庭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并由此带来了十分不同的后果。

上层家庭如愿以偿地在教育改革中弱化了学校教育、获得了充足的自主支配的时间。上层家庭的子女一方面没有升学的压力,另一方面上层家庭有钱有闲,他们就可以在自主支配的时间内实现他们的教育目标:一是训练子女广泛涉猎各门学科的文化知识,培养他们把读书思考当作生活习惯,而不是功利地学习应试知识;二是通过请家教、上培训学校提高子女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能力;三是通过旅游和实地体验,让子女接触社会和大自然,了解社会和自然知识;四是带领子女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底层社会生活体验,培养他们跟各式人等打交道的能力;五是他们可以将子女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就读,最后的公立学校虽然弱化了文化教育,但是综合素质方面(搞活动、道德素质、生活能力等方面)搞得有声有色;六是



认真学习，学到忘我

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教育政策,在学生录取中增加素质教育的比重(如幼儿园要面试才艺、奥数加分、985高校自主招生等),等等。总之,上层家庭的培养方式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其子女生活的一部分。上层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既有知识灌输的一面,也有思维训练的一面,既有强制教育的一面,也有快乐教育的一面,将素质教育与知识灌输两种教育方式的优势结合得较好。这样培养下来,其子女不仅文化知识丰富、综合素质高,应试能力也很强。

中产家庭既有子女升学的压力,又有向上层家庭培养子女看齐的压力。前文已述,中产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并不稳固,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直接流动至上层的机会,通过应试教育进行代际流动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知识和应试能力的培育,但是当基础教育改革弱化学校教育后,他们就得通过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进行弥补。同时,他们在素质教育上也向上层家庭看齐,希望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更何况拥有某项特长能够在高考中加分,也是他们所期待的。因此中产家庭十分重视素质教育。另外,当前中国城市中产家庭在计生政策下多数只有一个小孩,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崇尚质量高于数量的理念(多生几个不如把一个培养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因而能够倾注一切去培养小孩。

基于这些理由,中产家庭在小孩教育上的竞争就十分激烈,他们都希望通过家庭教育和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来提升子女教育的水平,以期他们在高考竞争以及后面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竞争越激烈,他们的压力就越大。也因此,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就相当重要和关键。

中产家庭一般是双职工家庭,缺少机动的时间,而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都需要占用父母中一方的时间,因此中产家庭要想给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就得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在市场上购买的教育资源越是优质,花费就越高,中产家庭在这方面也有经济压力。总之,中产家庭之间的竞争既集中在子女的升学上,又聚焦于子女的素质教育上,两个方面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就使得他们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的子女也是负担最重的群体,他们既要在应试成绩上力争上游,又要在综合素质上不落后,他们在学校的负担减轻了,但在校外的负担却增重了。

底层家庭的小孩有升学的压力。应试升学是底层家庭代际流动的唯一途径,他们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培养小孩。但是基础教育的减负改革对于他们来说是噩梦,直接断送了他们努力的机会。一方面,弱化学校教育,使得小学初中无法学到足够参与应试竞争的知识和能力。在校时间缩短、课程减少、难以程度降低等使得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很少。学校不考试、不排名,学生本身没有学习的推动力和积极性。不对教师进行县乡和学校等级别的业绩排名,教师的积极性也降低。这种状况在越差的学校越突出,农村学校基本上整体沦陷。农村只要有点能力、能在县城买房子的家庭,都尽量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如果买不到学区房,就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民办学校依然实践过去公立学校的体制机制,能够满足这批底层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家庭都有能力将子

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大部分农村学生只能滞留乡村学校。另一方面,底层家庭无力提供家庭教育,亦没有能力在市场上购买教育资源。前文已述,底层家长文化程度不高,劳动力配置比较刚性,家庭收入有限,因而既没有文化、也没时间、还没经济能力给子女提供像样的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乡村的校外培训机构稀少,有少数文娱类的培训机构,文化课培训机构几乎没有。

浙江上虞某镇是个中心镇,该镇只有一个毛笔书法培训机构,我们调研村的文书想给儿子培训文化课也只有网络英语培训。这样,底层家庭的小孩在家时父母没有时间管他们的学习,爷爷奶奶管不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参加市场化教育培训,他们的校外时间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不可能自觉学习。他们在学校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底层家庭的小孩文化课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也差,即便有些负责任、想认真上课的老师在一群差生面前时间一长也会丧失积极性。小学初中的文化基础没打好,不仅考不上好高中,进了高中学习也很吃力,高考也考不出好成绩。我本人就读过的县一中是全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最近十年走向落寞,清华北大绝迹,现在连华科武大都难以考上了。我之前的班主任对此描述说,“你给我一棵白菜怎么让我做出一碗荤菜出来”,意思是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没打好,高中就没有竞争力。

当前基础教育以“减负”为导向的改革,确实很好地实现了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但却给中产家庭的父母和小孩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尽管压力大,中产家庭尚能够在竞争中实现突破,他们子女的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多数能够考上较好的大学,并且一部分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底层家庭的子女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根本无法应对升学考试,当家庭又无法支付昂贵的市场化教育成本时,他们在应试中就难以与中产和上层家庭的子女竞争。

(2018-8-10 观察者网)